

当代学人·文论丛

延边大学“211”项目

10-13thji
songlirwenhua
jiaoliuyanjiu

10-13世纪 宋丽日文化 交流研究

李梅花 著



華齡出版社

本书承延边大学“211 工程”项目资助出版

10—13 世纪 宋丽日文化交流研究

李梅花 著

华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0—13 世纪宋丽日文化交流研究/李梅花著.

-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5.12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11辑)

ISBN 7-80178-346-8

I. 1… II. 李… III. 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中国、朝鲜、日本—北宋
IV. ①K203②K312.330.3③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9761 号

书 名:10—13 世纪宋丽日文化交流研究

作 者:李梅花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34)

印 刷:北京凯通印刷厂

版 次: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2 月第 1 次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8.75

字 数:243 千字

印 数:2000 册

全套定价:210.00 元

前 言

本书的研究内容,如果从宏观角度来看是10—13世纪的东亚文化关系史,具体而言,就是这一时期东亚主要国家的文化交流史。起初,题目定为“10—13世纪中韩日文化交流研究”。但是,考虑到10—13世纪在中国大陆相继出现三个王朝即五代十国、两宋及元朝,而朝鲜半岛则有两个王朝即统一新罗和高丽王朝,这样一来,就容易造成研究范围杂乱、内容涣散等问题,所以就改为“宋·丽·日文化交流研究”,目的是把10世纪前半期高丽与五代十国的文化交流、13世纪后期高丽与元朝的文化交流排除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外,以期内容更集中、更深入。另外,10至13世纪大抵相当于日本平安时代后期至镰仓幕府前期,日本当时正处于律令制日渐解体、将军、武士为主体的公武“二元政治”形成阶段,很难用某一特定术语进行标明,于是就使用了“日本”这一通称。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补充完成的,从收集资料、撰写论文,到通过答辩、修改论文,历时几年,期间种种,一言难尽。今天,成果终于得以出版面世,心里既紧张又激动。文化和文化交流是何等复杂和庞大的研究课题,而且本书还涉及三个国家,要想全面而又深入地阐述这一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内容,并且能够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提高,并非易事。本人试图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透彻表现宋·高丽·日本文化交流的独特风貌,但以本人目前的才智和能力,不仅会有力不从心之感,而且肯定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出现谬误和遗漏也在所难免。之所以将之交付出版,并不是有充足的自信,而是想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公诸于众,以求各位专家和学者的

批评和指正,进而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认识能力。

本书在完成的过程中,得到了我的导师李宗勋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李宗勋先生也付出了很多辛劳。另外,朴文一教授、姜龙范教授、金成镐教授、郑永振教授也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从他们身上,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而且还学到了许多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他们那种外和内刚、循序渐进,虽不张扬却是泱泱大道的人品和风范,是我现在和将来工作学习的榜样和目标。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另外,已经谢世的恩师姜孟山教授生前也一直很关心我的学业,希望这本迟到的书能够安慰他的在天之灵。

本书得以出版,还要归功于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为了让我安心学习和工作,我的家人在我攻读博士学位和撰写论文的整个过程中付出了很多辛苦,我的父母和妹妹包揽了照顾女儿一逗逗的一切事宜。在我最困难和无助的时候,他们是我坚强的后盾和温暖的后方。我的夫君韩继镐先生也一直默默地支持我,是他严格的督促和无言的关爱让我坚持走到今天。对于女儿,我则满心愧疚,所幸她长得健康聪明,并且理解和深爱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此书就算是献给她的一份礼物吧。朋友和同事们也一直以各种方式关心我的学业和生活,我取得的每一点点成绩都得到了他们由衷的祝贺和赞扬。做学问是刻板而寂寞的,但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感到很充实,很幸福。谢谢你们!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编辑部特别是潘萌先生的协助,种种琐碎之事皆由潘先生代劳,在此道声辛苦!

本书的出版承延边大学“211”工程出版基金的慷慨资助及延边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院长朴灿奎教授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李梅花

2005 年 3 月于延边大学

内容摘要

两宋时期,中原王朝处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军事威胁之下,不复昔日大唐一统天下的局面。高丽王朝从本国利益出发,改变原来的“一元”朝贡外交,转而推行“多元”朝贡外交。日本自894年停派“遣唐使”以来,断绝了与中国的往来,尽管期间双方有过几次国信往来,但不足以恢复国交。高丽前期与日本的关系处于冷淡的停滞状态。从当时整个东亚的局势来看,各国的民间往来相对比较活跃。

受此影响,宋丽日文化交流的内容和渠道随之发生变化。宋丽文化交流在官方关系维系期间即北宋及南宋初期比较密切。在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双方展开了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使节、留学生、移民、僧侣、艺术家、医生等的往来络绎不绝,促进了宋文化在朝鲜半岛的进一步传播。由于宋日之间始终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加之日本在平安末期实行锁国政策,只有僧侣在朝廷特许下得以入宋,所以两宋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主要以佛教为载体。至于高丽和日本之间,几乎没有发生文化接触。

两宋时期,以程朱理学和佛教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对高丽和日本产生了深刻影响。尽管在理学大发展的南宋大部分时间里,宋丽之间中断了国家关系和文化交往,但由于高丽始终关注宋朝思想界的新动向,并与之保持高度一致,所以在高丽末期能够顺利接受并引入朱子学,而朱子学一经传入,立即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武器,指导了高丽末期改朝换代的社会改革运动。在日本,朱子学是作为“助道”工具,是为宣传禅宗而传入的。尽管如此,朱子学不仅在日本的儒学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且还卷入到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中。

高丽佛教作为维护大一统局面的重要思想工具,受到宋代诸教宗融合、三教融合的思潮影响。而日本随着新兴武家政权的建立,禅宗传到日本后不仅对武士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形成日本独特的“禅”文化。

文化交流是承续和变异的统一,总是处在动态的系统中。宋丽日文化交流必然在继承前期文化交流成果的基础上,随着各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断提高,表现出新的时代特点:传统的文化交流模式有了逆转的趋势,边缘文化开始向中心文化挑战,并有反传和回流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文化交流的开展,高丽和日本在前期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的消化能力提高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增强了,他们对外来文化不再盲目崇拜,生搬硬套,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和引进,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了融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宋丽日文化交流背景	(15)
第一节 宋丽国家关系和贸易关系	(15)
一、宋丽国家关系	(16)
二、宋丽贸易关系	(23)
三、实际邦交的使者—宋商	(28)
第二节 两宋时期的中日关系	(33)
一、平安后期日本锁国政策与宋日民间贸易	(33)
二、北宋政府与日本的几次牒文往来	(38)
三、镰仓幕府的开放政策与宋日贸易往来	(40)
第三节 高丽前期与日本的关系	(45)
一、漂流民的送还	(45)
二、半官半民的丽日贸易	(51)
第二章 以宋为中心的宋丽日文化交流	(55)
第一节 宋丽文化交流	(55)
一、使节往来	(56)
二、高丽留学生	(71)
三、宋投化人	(77)
四、僧侣往来	(82)
五、艺术交流	(93)
六、医药交流	(96)

第二节 宋日文化交流	(99)
一、北宋时期:日本天台宗僧的入宋巡礼	(100)
二、南宋时期:中日禅僧的求法及传禅	(106)
第三章 宋代程朱理学对高丽和日本的影响	(131)
第一节 宋代程朱理学发展概述	(131)
一、新儒家、道学、理学	(131)
二、程朱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135)
三、程朱理学在两宋的地位	(142)
第二节 宋代程朱理学对高丽的影响	(148)
一、高丽前期对程朱理学的接触和认识	(149)
二、高丽末期朱子学的传播与普及	(155)
三、朱子学对高丽末期社会变革的影响	(160)
第三节 朱子学的传入与日本儒学的复兴	(170)
一、禅僧与朱子学的传入	(171)
二、朱子学的传播与日本儒学的复兴	(176)
第四章 宋代佛教对高丽和日本的影响	(181)
第一节 宋代佛教的中国化与禅宗	(181)
一、宋代佛教的中国化	(181)
二、宋代禅宗的发展与分派	(184)
第二节 宋代佛教对高丽的影响——以义天和知讷的佛 学思想为中心	(187)
一、义天的佛学思想	(187)
二、知讷的佛学思想	(191)
第三节 禅僧与日本的文化移植	(196)
一、禅僧与镰仓武士精神	(196)
二、禅僧与“五山汉文学”	(200)
三、禅僧与日本茶道	(204)
四、禅僧与印刷、书法绘画、建筑等	(207)

第五章 宋丽日文化交流的特点及意义	(214)
第一节 传统文化交流渠道的逆转	(214)
一、工艺技术的创新与反传	(214)
二、汉籍西渐	(218)
三、佛学思想的超越	(220)
第二节 民族意识的自觉与民族文化的定型	(224)
一、高丽诗话中的民族意识自觉	(225)
二、日本民族文化的定型——“国风文化”	(229)
第三节 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和内在化	(233)
一、高丽的儒佛道杂糅	(233)
二、日本的神儒佛一致与佛教的民族化	(236)
结 论	(240)
参考文献	(242)
附表 1 宋丽日文化交流大事年表(10—13 世纪)	(253)
附表 2 宋丽日三国年表	(259)

绪 论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近年来,东亚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领域开展合作与交流,发展势头迅猛,成效显著,这对东亚地区的繁荣和稳定无疑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就东亚而言,文化交流与合作始终是这一地区全方位合作中不可忽视的一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这一地区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研究历史上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甚至冲突与决裂,无疑对当今各国进行外交决策和民间交流有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学界相关成果虽然丰硕,但发挥的空间和研究的潜力仍然很大,所以从学术角度看,本课题的研究也未尝不是一次必要的努力。

本课题以 10 至 13 世纪宋丽日文化交流为主要研究对象。之所以把三国文化交流的时间范围限定在 10 至 13 世纪,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从理论上讲,任何文化系统总是承续和变异的统一,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韩国文化、日本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容、性质和影响都有很大差异,所以确定比较具体的时间范围是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第二,以往学界对古代三国的文化交流大都集中在隋唐时期,而对两宋时期的东亚三国文化交流及意义重视不够,研究不深。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三国无论是在各自的文化发展轨迹,还是在对外文化交往方面,都表现出与前后时期截然不同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就文化交流的整个动态系统而言,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任何文化交流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也不是在孤立中发展,因而也就必然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其中文化交流双方的国家关系不仅会改变文化交流的轨迹和内容,有时甚至会终止文化交流的进程。作为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交流可以说是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延长与继续。宋代以前,中韩之间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北宋建立后,由于宋朝的“礼仪之治”与朝鲜半岛历朝君王以“诗书礼乐之道”进行封建统治的愿望相一致,这种一致性也就成为两国处理外交关系的人文基础,宋丽关系很自然地承续了前代的唐罗关系。但是,随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相继崛起和日益强大,中国大陆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宋朝的“礼仪之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束手无策,毫无抵抗能力。与此同时,为了保全自己,高丽王朝在外交上实行“多元”朝贡政策,即在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的同时,与辽、金政权保持朝贡关系,甚至在两难的情况下,就辽、金而舍宋朝,中断与宋朝的外交关系。宋日关系方面,自日本于894年停派“遣唐使”以来,直至两宋王朝,两国始终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商人和僧侣的往来仍然频繁。其间,双方也曾有过几次国信往来,但始终没能恢复国家层面的外交关系。至于高丽和日本的国家关系可以说进入低谷,处于冷淡和疏远的停滞状态。从整个情况来看,当时东亚的国际局势是:传统的东亚朝贡册封体系发生动摇,中国的中心地位和绝对权威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各国之间的民间交往不绝如缕,始终不断,商人和僧侣成为外交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盛唐开创的良好国际通交基础上,随着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航海、造船等技术的进步,三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既是前期的继续和延长,同时又表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其中,宋日文化交流尤其值得关注。北宋时期,正值日本平安时代后期,随着“遣唐使”的废止以及朝鲜半岛上统一新罗的灭亡,日本开始与外界隔绝,实行锁国政策。由于缺乏进一步刺激和滋养,原来大规模引进和移植的“唐风文化”开始逐渐失去活力转而融入到日本的风土之中。与此同时,日本的民族文化日益繁盛,“国风文化”在整个日本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得以确立和定

型。而在南宋的大部分时间,日本大抵处于镰仓幕府前期。镰仓幕府的主体是与奈良、平安贵族截然不同的将军和武士,新建立的武家政权为了打击和削弱公家贵族文化,急需新的文化养料作为精神支柱,而其时南宋文化开始走向成熟,从而成为日本武家政权寻觅的新文化源泉。这样,继盛唐之后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接受唐朝文化继而形成“和风文化”的较为丰厚的文化积淀上,与南宋这一新的异质文化发生接触,由此其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另外,随着高丽和日本自身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其文化主体观念和民族自觉意识随之高涨。高丽建国之初,太祖王建就提出,在继续学习和吸收中原文化的过程中,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注意民族和风俗的差异性,“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殊方异土,人性各异,不必苟同”^①。高丽成宗时期(982—997)名臣崔承老指出,“华夏之制不可不遵,然四方俗习,各随土性,似难尽变,其礼乐诗书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华,以革卑陋,其余车马衣服制度,可因土风。”^②进入高丽末期,儒家士大夫们在跌宕起伏、风雨飘摇的国家命运和个人际遇中,再次深刻体会到保持民族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高丽末期的名儒李谷(1298—1351年,李穡之父)指出“四方荒徼,风俗各异,苟使同之中国,则情不顺而势不行也,势不行情不顺,而善治之虽尧舜不能矣。”^③而日本早在9世纪,汉学家菅原道真(845—903)^④就呼吁“非和魂汉才不能阙其闾奥矣”。10世纪,诗人大江为时指出了当时日本文坛刻意模仿中国的形式主义文风:“我朝遥寻汉家之谣咏,不事日域之文章。”日本划时代巨著《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1015)虽然是深居宫廷的一介女流,但也明白“凡人总须以学问为本,再具备和魂而见用于世,便是强者”。上述言论意味着高丽和日本至少在文化领域

① 《高丽史》卷2,太祖26年夏4月条。

② 《高丽史节要》卷2,成宗元年6月。

③ 《高丽史》列传卷22,李谷传。

④ 日本平安朝前期重臣,文人。历任文章博士赞岐守、参议兼式部大辅。被日本后世奉为天满天神,即“学问之神”、“书法和文字之神”。

开始注重本土性和民族性,而这种认识对激发民族文化的自觉创造极为重要。日本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对异质文化进行了重新整和,从而创造出独特的民族文化。

由此,在宋丽日文化交流中,不仅有宋文化的“东流”,而且还有高丽和日本文化的“西渐”。丽日两国在意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建设民族文化的同时,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产生了平等意识,对待中原文化,不再是全面引进和照搬移植,而是有选择地学习和吸收,并将其本土化和内在化。文化交流的这种取长补短现象和平等自尊态度,大大丰富了文化交流的内容,意味着这一时期的东亚文化圈开始实现一个文化整体内部多元文化的复合,这对东亚文化圈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转变。考察其中的关键,对于我们将来构筑一个稳定、持久并具强大生命力的东亚文化圈极具参考价值。

基于上述考虑,本课题试图在东亚史的框架内对 10 至 13 世纪宋丽日文化交流进行立体横切,在纵向上追溯宋丽日文化交流轨迹的同时,从横向上揭示这一时期文化交流对三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圈的广泛影响和深远意义。

二、研究动态

(一) 中国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学者就开始致力于东亚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外交工作全面展开,为了增进国际友谊,促进外交事业的发展,相继出版了一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史著述,如周一良的《中朝人民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1 年版)、张政烺的《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开明书店 1951 版)等,这类著述因重在普及,学术性不强。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术研究陷于停顿,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几乎成为“禁区”,学术论著自然寥寥无几。

进入 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各国尤其是亚洲“四小

龙”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东亚地区经济腾飞的社会背景及文化动因,加上宽松的学术环境,相关研究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相关著述主要有:朴真奭的《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声振的《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4月版)等。

上述研究成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可以说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相关领域的最新成就,意味着大陆学术研究从政治斗争向经济文化的转型,就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著述也仍然具有相当的学术参考价值。但是,由于相关研究人员大多从事关系史研究,因此往往重视政治、经济关系史,而对文化关系史的论述不够深入。从体例上看,这些著述大多为通史类,所以很多问题的研究不够细致深入。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主要是梁氏多年来的文章汇总,包括文学评论、杂文、发言稿等,其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主要是以特定人物为线索展开的。朴氏的著述倒是货真价实的文化交流研究,但也因体例和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问题的研究点到为止,给人以粗略之感。反倒是夏应元的两篇论文,即《中国禅僧东渡日本及其影响》(《历史研究》1982.3)和《宋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学报》1983.5),因为是从断代史的角度入手,聚焦于某一特定时期和特殊阶层,所以在论述的时候能够从容展开,直到今天仍具参考价值。

相比之下,中国港台地区的研究已经进入了相当细化和专门的阶段。其中,黄宽重和宋唏在宋代文化关系史领域的研究比较活跃和突出。黄宽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南宋与高丽的关系》(台北中华民国韩国研究学会编,《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83)、《高丽与宋、金的关系》(《韩国学报》1985.3)、《高丽与金宋的关系》(翰林大学编《亚细亚学报》1986.1);宋唏的主要研究成果为:《北宋时期的中韩经济文化关系》(《中国文化》1995.2)。另外,余又荪的《宋元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2月版)、王仪的《赵宋与王氏高丽及日本的关系》(台北中华书局1980年9月版)等著述,对本文关于宋代东

亚国际关系的研究也颇有帮助。

进入 90 年代之后,随着中韩日国家交往的深入,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大陆学界的相关研究开始走向专门化。

就关系史而言,杨通方的《中韩古代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以史代论,把中韩古代关系用史料形式展开,对学术研究应注重原始材料进行了无声的强调。蒋非非等人编著的《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可以说是对学界前期成果的汇总,内容丰富,可读性较强,但仍不脱通史体例带来的研究缺点。杨渭生撰写的《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是开启中国大陆宋丽关系史研究先河的著作。其中,本书以图表形式详细整理了使节和商人往来及大事表,对后来者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此书的研究有很多独到之处,颇有见地,但有些细节研究仍不脱略述之嫌。另外,王勇的《中日关系史考》(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 1 月版)和王辑五的《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也是同期中日关系史方面的突出成果。

就文化交流而言,黄有福的《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杨渭生的《华严宗东传与中韩文化交流》(《韩国学论文集》5,北京大学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陈景富的《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对中韩佛教文化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是陈景富的著述,可以说是中国和韩国佛教历史的小百科,学术性和普及性结合得很好。另外,裴岚的《7—14 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和李岩的《中韩文学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7 月版),从考古学和文学角度勾勒出中韩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路子。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中日两国学者共同撰写刊行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版),分为 10 卷,从宗教、思想、制度、文学、艺术、典籍、人物、科技、民俗等方面对中日文化交流进行了全景式论述,是当时也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权威性研究。

另外,学界进一步开拓了文化交流的研究领域,旁及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叶坦、赵光远的《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朱七星主编的《中国·朝鲜·日本传统哲学比较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贾蕙萱的《中日饮食文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从比较的视角对中韩日文化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对我们把握各国文化的特质很有帮助。朴文一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郑彭年的《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版)、王勇的《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等著述,侧重文化交流的影响研究,可以视为这一文化交流研究领域的增容。

这一时期,学界也开始注重在东亚史的框架内审视各国文化及文化交流。盛邦和的《内核与外缘》(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陈玉龙、杨通方等的《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徐静波主编的《东亚文明的共振与环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12月版)、陆玉林的《东亚的转生:东亚哲学与21世纪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版)、高增杰的《东亚文明的撞击:日本文化的历史与特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版)等著述,在东亚文化圈的范围,对日韩三国各个层次的文化进行了剖析。

(二) 朝鲜、韩国方面

朝鲜方面的高丽关系史研究,侧重于高丽人民反抗外来入侵斗争方面,罕有关于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成果大多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以论文形式发表,如:金宰亨的《1216—1219年契丹入侵及其被歼》(《历史科学》1961.1)、《13—14世纪高丽和蒙古的关系(上、下)》(《历史科学》,1964.4—5)、朴永海的《高丽初期对外政策研究》(《历史科学》1966.1)、《11世纪末—12世纪初高丽击退女真(金)的入侵及高丽的对外政策》(《历史科学》1977.4)、《11世纪高丽